

刘
东著

理论与心智

LILUN YU XINZH

江苏人民出版社

刘
东著

理论5心智

LILUN-YU XINZH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与心智/刘东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14-02962-6

I.理... II.刘... III.社会科学-文集 IV.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34145 号

- 书 名 理论与心智
著 者 刘 东
责任编辑 周文彬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 2
印 数 1—6000 册
字 数 268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962-6/C·66
定 价 19.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自序

这里所结集的，多是我晚近写下的文字，间或也有少量成文稍早、而其他文集未及收入的篇什。

我原本是很怕当个“写作自动主义者”的——那将意味着，不管内心中是否攒足了创作冲动，也不管形诸文字的东西是否打好了腹稿，更不管别人（乃至自己）是否说过了（甚至听腻了）类似的话，反正每天都要洋洋洒洒地下笔千言，而把本属自家内心的迟疑与检省——包括检省一下“能否自圆”和“是否掠美”这样的低级错误——统统留给其他还愿意较点儿真的同行。我觉得，当前学界的许多丑闻和更多的流弊，都是这种“写的竟比想的还多”的恶习所造成的——而这种积习又是由热衷于制造虚假繁荣的技术官僚促成的。正因为这样，尽管自问并不算疏懒，多年来从未有过“星期天”的概念——就更别提“放假过节”了——我却宁可珍惜一点笔墨，把精力投给到更值一做的工作，尽我所能地去拓展尚可自主的知识空间，包括兴办民间的丛书、杂志、研讨会和讲坛，以便为真正具有意义的写作，提供稍许坚实丰厚的研究背景。

我这辈子还顶怕当个“画地为牢的专门家”——那将意味着，只要平生最早遭遇到了哪个学科、哪位师长、哪种理论、哪家门派，就一辈子死死护紧了这块封地，不光自己不屑于步出圈外

一步,还要反感和抵触别人胆敢跨进圈内。久而久之,本该焕发自主精神的求索过程,反被弄成了先入为主的偶然领受,成了迂腐庸俗至极的“吃哪碗饭”——其实就算这门行当还能帮助谋得稻粱,也一定是天下最乏味的谋生手段了。正因为这样,尽管作为相信只有现世的中国人,惟有学业差可称作自己的“宗教”,才能唤起自己持久的兴奋和甘愿的牺牲,但我却天生厌恶老是在“一个坑里刨食儿吃”——如果不考虑“今之学者为人”的堕落因素,那么就某一论题写个二三篇还是写个八九篇,所需的阅读量和思考量并无太大差异,因此只要围闭在某一狭小的领地,脑筋就必然犯懒,胸襟就必然促狭。

以上的话,既可以被读作我的开宗明志,也可以被读作我的自我解嘲——正是天性深处的某种东西,导致了这本文集的基本特点,至少在表面形式上是如此。正因为不愿意飞快地写,尤其不愿朝一个固定的方向、以一种固定的风格集约化地生产,就既限制了本书的部头——尽管还有不少不宜收入本书的文字,也是我近几年写下的——又没能限制住它的论题——往好里说或者不失为广博,往坏里说则会涉嫌于芜杂。由此就不免生出几分踌躇:尽管在这些文章谋篇之初,总有些非说不可的话,也曾尽量想把它说到位,但等它们要被编集成册了,却又怀疑这些脱缰之马,是否果然值得开卷一读——想来想去,还是把它们和盘托出,请读者去自行褒贬罢。

第一辑的论述重心在于“方法与学风”。这类检思当今学术生态的内容,其涵盖面相对要宽泛一些,大致构成了其他论说的基础和背景,遂也就把它摆在了前头。第一篇文章是《理论与心智》,它虽然被排在首位,却是刚刚脱稿的,所以既可以说是全书的导言,也可以说是全书的结论。事实上,我是在这本文集比及

成形之际,才专门撰写此文来提纲挈领的,其标题后来也被借来命名了全书。虽然我不敢奢望,这种从一对认识论范畴之内在张力入手来澄清意识结构及其发展动力的思路,就一定会有助于别人去廓清当今学界的乱象,但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这却是相当艰苦的清理和自赎,因为我已把所能想到的照顾面,都尽力糅进了一整个叙述结构之中,以防要么因为迷信理论而心智不全,要么因为不信理论而心智不全,而这正是目前困扰人们的两大偏颇。第二篇文章是《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从年代和缘起上看,也许它更有理由排在前面,因为当初正是它率先挑明了本土心智与外缘理论的冲突,并从此引发了有关知识与权力的迄今未稍消歇的“内外之争”。后来我又应澳大利亚黄乐嫣教授的邀请,为此文的英文本补写了一长段导引,更周详也更尖锐地阐明了我本人的立场,而这段文字迄今尚未在中文世界里发表过。当然说到“尖锐”二字,还要特别请读者留意,至少根据我本人的理解,学界同人间爆发的激烈战云,虽未必总能避免意气之争,但一俟其间的硝烟散尽,真正值得一提的仍只有学理本身,看它有没有获得增益和廓清——正如天下只要有学术机构在,就免不了要闹“学院政治”,然而只要当事人还属于学者,此类摩擦就终非学术活动的全部,甚至也不会是它主要方面。

接下来的两篇也有类似的关联。前一篇《学界的“冷战思维”》,旨在检讨外间的治学环境。我在某次访美归来之后惊讶地发现,尽管自己并未因为论战而跟谁断交,反而还“不打不相识”地广有新交,可就国内民间学界的流行风气而言,竟已隔离出了很难化解的门户之见,咬定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由此,不管别人听也不听,总得有人挺身出来大声疾呼——如果再博弈不出理性的规则,并以此来约束和拯救自己,那就别再提替中国想清什么了,连学界本身都会蜕化成社会的

毒瘤。后一篇《别以为那离我们还远》，旨在清算内心深处的误区。我检讨自己受特定“问题意识”的框定，由于惟恐被改革的阻力所利用，便至少在国内的言说语境中，往往有意略去现代性的负面，哪怕明知它无时不在侵害自己。于是，本文便以中国的环境危机为例，认为它有可能从一场重大的生态灾难，转变成当代心智史中的一件大事——从此促动我们保持对于自身意识边界的敏感，从而保持精神生机的鲜活，并以这种灵活的调整心态，争取把当代中国的这局棋下活，使之不再只表现为西方历史的变态形式。

第二辑的论述重心在于“中国思想史”，无论那些思想先驱者距离我们是远是近。《也谈忧乐》一篇成文稍早，是我在通过博士答辩后不久，就庞朴教授所谓“忧乐圆融”的说法，恭恭敬敬呈上的一封“论学书”。——说到这里或应交代一下，我的求学年代有两位主要的导师，一位是公开的业师李公，另一位就是私淑的老师庞公；有时他们的学术见解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作弟子的也往往需要居间判断。而这一回我基于美学的学理认定，惟有乐感（审美判断力）才有圆融的能力，可以同时化解作为意向性的“忧思”的两端（“所忧”和“所以忧”），所以也就在对于中国文化特性的判定上左袒了李公——乍看这种辩谈似嫌“经院哲学”，实则对于如何守先待后却是至关紧要的。《儒教文化圈中的自然观念》一篇成文稍晚，原是我应瑞典龙德大学 Bo Wiman 教授之邀，就 Christopher Drake 教授的《作为过程与副词的自然：前现代之日本的诸结构》一文所写的回应。不过此文也可以单独成篇，因为它从追踪“天”的字义变化入手，以“神明之天—可疑之天—疏离之天—自然之天—伦理之天—审美之天”的递进为主线，寻绎了中国文明特有自然观念的发生与发展。由此，本

文就提出了儒家自然观念的要义,并藉此而在生态哲学的意义上,向现代性提出了审美文化的深层申诉:正因为大自然在化育生命方面跟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类在本质上同构,而人类的生命本能只不过表现为去协助大自然的合乎伦理的化育过程,所以人类对于整个世界都负有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应太过放纵主体精神的自高自大。

紧随其后的三篇,则把检思转向了中国现代心灵,且都跟“五四”这个“重大话题”有关。《失去儒家制衡的“个人主义”》一文,从追问周作人附逆的深层思想动机入手,发掘出了“儒(孔孟)杨(杨朱)互动”的传统文化心理,并顺势发现一旦作为文明栋梁的大传统遭到毁灭,受其抑制的小传统便会报复性地疯长,并与外缘文化因子杂交成怪胎;所以,历史上的五四运动并不像一些人想象得那样单一。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是,出于和周作人相似的利己动机,人们已经倾向于淡忘历史上的旧恶;所以本文也旨在剖析,周作人其实是很不会“做人”的——既然“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的小我并不稟有向外超越的精神动因,其狭隘和极端的自利情结就无助于在反复博弈中逐步建立起公共领域,从而也就必然要妨碍或推迟社会的发育,反使人们原本最看重的私人领域遭到最无情的侵犯。《衰朽政治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文,到现在还被网民们贴来贴去的,其实原是我纪念“五四”70周年的急就章,当年是一夜之间一气呵成的,而那时的中国毕竟还享有更开阔的可能性。不过,也许已经受到其时初露的悲情所点染,遂使我跟从笔下的胡适一起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在一个衰朽的政治中,偏要去做一个只有在正常有序的政治中才能发挥作用的自由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自己在一个合乎理性的民主制度下应该扮演的角色,却看不出自己在一个不合理性的专制制度下应该何去何从;过多地寄望于舆论的监督作用,却没

有想到在一个不尊重公意的政权眼中舆论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对于文中的一些主要判断,我至今仍保持着基本的认同,否则这篇文章就不会入选了;然而我后来却也意识到,若把这些判断跟另一些判断有机勾连起来,至少可以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而这正是后面那篇《公理与强权》一文的写作动机,当时又到了纪念“五四”80周年的关口,而且公众关注的焦点又轮转到了外患方面。此文戏剧性地凸显了“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在中国舞台上的反复压倒,以暴露“本质主义西方观”对国人思想的贻误——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可怕的障眼法,有可能把原本有利于加深认识的历史契机,一误再误地简化为“又看透西方一回”的原地打转。同时本文也强烈呼吁,绝不要因为外部压力而倒向另一边,忘记了正因为要去寻求富强,正因为需要社会的长治久安,“德先生”才成为保持基本向心力的认同目标,才成为不仅不可以抹煞、也同样不可以被凌驾的口号。

第三辑的论述重心在于“比较文化”。在这个领域,鉴于自己以往的基本学术训练,也鉴于自己长期主持的特定翻译工程,其重心自然要落在比较海外汉学家的成果,特别是他们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成果。具体而言,我是希望通过“海外中国研究”这个学术案例,来比照“国学”与“汉学”这两种知识谱系,以期既在方法层面检讨“比较之学”的成败利钝,又在内容方面启动对于“中国性”的不断颠覆与重构。头一篇《文明边际的对话》,旨在通过解读美国学者郝大维与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来引申比较哲学在全部哲思中的优先性:既然解构风潮已把运思是否符合“工具理性”的问题,还原成了隶属何种“价值理性”的问题,从而把本应决然排他的“真理问题”,瓦解成了仅具描述性的“文化问题”,就迫使人们不得不潜回各个文明的原点,来倾听几大

圣哲间的迟到了数千年的对话；于是，这种文明间的交互性运思，就既有可能帮助别人“通过孔子而思”，也有可能促动我们自己“通过苏格拉底而思”。次一篇《**比较的风险**》，却又回过头来检讨上面的主张——它通过追溯跟法国汉学家于连的对话，来凸显“比较”作为一种方法的内在危机，甚至把它描绘成有可能压扁心智的当代宿命。由此，本文主张要把比较之思深探进文明内部的各个向度中去，把握住大传统和小传统、显文化和隐文化、大空间和小空间、雅文体和俗文体、表面上和骨子里、虚文性与实用性的微妙区别，以免对总体文明进行率性的极化处理。再一篇《**韦伯与儒家**》，则又从接受语境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它通过回顾韦伯学说与儒家传统在短短十几年间的三次遭遇，示例了当代知识生产的舆论气候及其急剧变迁，并藉此对刚刚发生的最无宗教感的宗教哲学热进行了精神分析。此文在展示了两大文明间对话的持续、反复和强韧之余，却又憧憬着它们的彼此激发和深层亲和——正像韦伯学说和儒家思想虽然屡有纠葛，却又在一个更深的向度上不无相通：那不再只是本体论或认识论体系的某种附庸或推绎，而照样可以满足最激越的想象和施展最透辟的思力；那不再要求把终极关怀寄托在实际生活之外，却又足以使之结成精神的某种超越存在形式，来同须臾不能稍离的人间问题构成持续的紧张。

以上三篇都是从具体对象引发开去，而此后三篇则另属一类，都是视具体发言场合的需要，来对大洋两岸的两种“中学”进行总括的对比。《**“国学”与“汉学”**》一文，原是我在“20世纪国际汉学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它针对晚近围绕“汉学”一词所出现的语义混乱，指出它在知识类型上属于国外“区域研究”的一个分支，是应着其他文明从自身需要出发来认识中国这样一个问题意识而确立的，所以本质上属于外国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精

神产品,且必然随其原有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演进。正因为如此,“汉学”一词又必然随着西学自身的演进,在当代语境中衍生出宽窄两义:广义上,它可以指称“一切非本土的研究中国的学问”;狭义上,它(Sinology)则与以现代方法来研究现代中国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相对,仅指以传统方法来考释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经典文献的学问。《十年甘苦寸心知》一文,原是我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年回顾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它通过回顾自己心路历程的三次递进,发现居然大大出乎自己原初的逆料——这套书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引进了多少孤单的断论,而在于以相对完备的覆盖面,引进了一个自我更生的自成一统的学术过程,从而为我们的精神视野树起了另一个参照系。而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参照系,就不光应当感激国外同行的学术洞见——它促进了国人的多元自我意识,使大家广角地环顾着中国——甚至还应当感激他们的文化偏见——它诱使国人去努力理解别人的立场,进而渐次管窥到了西学本身的奥妙。《汉学: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一文,则又以更沉稳的书面形式,细细揣摩《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就汉学所提的尖锐问题,其间涉及的问题虽然林林总总,最重要的还是在一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对于“文明间性”重要性的重申——即使在“中国学”这个有限的经验领域,也应当主动鼓励、而不是消极泯灭精神样态的无限多样性。在文化交流步步深入的现代世界,中国已构成了其他文明的生活背景,已不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所以,在汉学家提出问题的独特视角、解决问题的独特方法,以及潜藏其后的独特话语体系中,总会出现并不为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形象;而对这类总在颠覆我们现有自我意识的学术成果,我们并无特权去判定那属于别人的优点或缺点,而只能虚心加入那个兼听则明的国际研讨班,否则就无法在互相倾听和进言的基础上,去构想真正超越

国界的未来“中国学”。

再接下来一篇是15年前的旧作《倾听德国性灵的震颤》，若不是出版社的先生打电话提醒，我早把它忘得干干净净了。此文的初衷原是评论《诗化哲学》一书，而文章发表以后，作者刘小枫却写信致谢说：如此帮助他涂抹文饰，心中过意不去。我先是不解小枫何以如此过谦，后来读到他的《拯救与逍遥》，方知其立足点已从审美陡转向宗教了。既是如此，我那些引为知音的段落，便已成为历史的遗踪，只除了文末的相互切磋，还保留着它的原初意义——“在要求人类诗意地去活这一点上，德国精神确乎已经相当接近中国以审美为本位的传统乐感文化了。正因为这样，读者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一本倾听德国心音的著作中，小枫却总是倾向于借中国传统文化来作结论。”“点出这一层是相当重要的，这使人们可以联想到，作为一种至上境界，‘天人合一’几乎是人类各种文明价值的最小公约数。不过，为了免使读者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也许还应该补充一句：尽管同是‘与天地参’，但由于德国性灵已在近代分裂为二（梦想与现实），而中国精神尚停在古代的浑然为一（只心便是天），所以，中国古典精神便因全一近在当下此处而恬淡闲静，而德国精神却因全一远在未来天边而紧张震颤。因此——万万不可误把中国精神径直当作了德国精神！”如果说，我过去不赞成小枫以己度人，从审美文化的中国视角去赞誉德国精神，那么，我现在仍然不赞成他又以人度己，从宗教文化的西方视角来截断中国精神。因为正像我多次表白过的：退一步讲，我愿意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认定了必须以精细的比较来逼近历史，以便为今后的创造保留多元的资源；而进一步讲，我又渴望追求普世的文明，不愿把各个文明间的差异率性夸大，从根本上闭死了相互沟通的起码可能。

第四辑的论述重心在于“知识生产体系”。我对这个话题一直投以极度的焦虑,甚至还曾主动向李陀请缨,要为他的丛书写一本这方面的专著——因为我从一个书生的角度认准了,惟此一点才是我们的国脉之所寄。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这方面是个绝不惜力的行动主义者,所以写下的文字也往往掺入了甘苦之言。一开始,《社科院的自我理由》一文,也许是本书中最为痛切的篇章,因为我在这个单位学习和工作了整整15年,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镇国之宝——也是自己本打算终老于此的地方——逐渐迷失了原本很有后劲的发展势头。实因为不甘和不愿,本文便分述了这座学府的蛰伏期、辉煌期和式微期,从而展示出它在整个国内知识生产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循着逻辑的力量逼出它的生存理念——在大胆构想激励机制的同时,又小心保留其超脱淡泊的心气,以期有助于维护自主治学空间,发挥一所最高研究学府对于全社会至可宝贵的“无用之用”。接下来,《中国大陆学术出版的现状》一文,原是我几年前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之邀而发表的一篇命题讲演。——说来有趣,由于两种知识生产体系各自的弊端,搁在这边常被视作“不务正业”的学者向着出版业的渗透,拿到那边却成为很让美国同行艳羡的东西,因为那边的太过细密的职业分工,甚至会使得他们忘了知识人还可以如此这般地焕发用世之志。基于对这种微妙区别的觉察,我便希望借此案例来支持一种信念:当今大陆的学术出版业,除了遵循内在理路去追求知识增长之外,还具备某种外在的文化含义——在维护知识生产严肃性的前提下,恢复理性思考在社会生活中的威信,从而在一个大大失范的生活共同体中,重新探寻和确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使命;因此,如果我们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在于知识阶层的自我期许之中,则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

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再往后,《中文能否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一文,则是为了吐露另一种心迹而写的书面答问——围绕着外间有关《中国学术》的种种问题。也许是天生爱唱反调,所以每逢走出国门,我就会像上一篇讲演那样,真心诚意地宣讲母国的希望所在,抗议他们看轻了国内同行,而一旦再走进国门,我又会像此一篇答问这样,同样真心诚意地大泼冷水,不赞成太过良好的自我感觉。当然从深层来说,这两种调子其实是统一的——凝聚于一种片刻不敢稍忘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后来就成了《中国学术》的纲领:“提升我国人文及社科的研究水准,推展汉语世界的学术成就;增强文化中国的内聚力,促进中外学术的深度交流;力争中文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参赞中国文化现代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重建。”如果拂去“爱国主义”一词所沾染的盲目与浮躁,我愿把这纲领形容为一种“学术爱国主义”,它一方面希望“力争中文成为国际学术的工作语言”,反对不分青红皂白统统不给汉语学术成果打分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吁求“提升我国人文及社科的研究水准”,反对把自己的被动局面统统归咎于别人的偏见和歧视。

此后的思绪,则转向了知识生产体系的另一侧面——高等教育,这也是无时不让人操心的一大忧患。《学校与社会》一篇,原是我对协和医科大学博士生班发表的讲演。受听众的制约,此处行文的一个主要特点也在于,从头到尾都利用了医学术语,来启发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诊断和治疗,甚至启发对于整个社会症状的觉悟——至少是若有所思罢!若按常理,学校无非是社会的一个单元,它理应排列在家庭之后,成为新生个体依次进入的第二个子系统,所以,要是作为大系统的共同体,弄得某个子系统跟其他子系统天差地别,那就暴露了我们社会的突出征候。正是针对这种征候,本文分从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视

角,来循序递进地探讨其间的病理原因——这样做的另一个理由是,按照我本人的理解,向理科学生发表单独一次的讲演,最重要的还不在讲清多少具体的道理,而在于以此种言说的内在结构,来演示一种不断探入底蕴的运思方法,那恰是他们寻常不很熟悉的。《关于电视辩论的辩论》一篇,记载了我跟郑也夫围绕此种特殊电视节目的一次交锋;鉴于以往的类似辩谈,事后整理录音时不堪其苦,所以这一回我们采取了更有效的形式——每人交替着写一段话,但一旦写好就不得再改,哪怕露出了明显的破绽。我就此表达的主要观点是:首先,必须区分两种形式的辩论,一种是“发自内心的辩论”,这种探求学理的交锋,当然可以活跃思想,另一种是“人为作伪的辩论”,它由于缺乏对真理的执着,反而无法松动头脑——因为加入后一种辩论的目的,并不在于战胜思想的片面,而只在于从气势上压倒对手,而且按照此种游戏的规则,辩论的立场本来就既偶然又僵化。其次,如果“为辩论而辩论”本属有害,一旦把它当成商品引入大众传媒,就愈发加剧了它的危害性——因为一方面,为了投合观众来争夺“收视率”,它会被包装得更加媚俗,使本需认真研讨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变成了轻松可笑的娱乐节目;另一方面,电视这种空前广泛的传播渠道,又会把这种“唇齿游戏”酿成世风,使人误以为这种预先排好的闹剧,就是研讨学理的校园生活的全部。当然,针对我这种“反方”的观点,郑也夫也另有一套“正方”的说法,我不便越俎代庖地总结,读者当可自行参看。

第五辑的论述重心在于“文化分析”。需要提请注意,我在此处未敢冒用“文化研究”这个范畴,尽管同是在研究分析“当代的”和“大众的”日常生活——惟恐由此引起对于伯明翰学派的太多联想,反而冲淡了或遗忘了其他可资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久

待激活的本土传统资源。根据我本人的体会,别看夫子自道“信而好古”,其实他当年又颇有用世之志,也颇爱针砭时弊,倒像是个做“当代研究”的,而只是在后世才演为经学的对象。所以,《论语》上所谓“温故而知新”,其精义便在于两者的平衡——把文化传统和文化分析结合起来。由此可知,其实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只要我们乐于和善于开掘,就不仅存在着某种资源,还存在着某种指向,足以跟当代生活构成持续的张力。《造型与造价》一文,正是在试验上述想法。它通过回顾苏轼营造活动的文化蕴涵,来反衬当今北京市政建设的缺憾,并追踪这种建筑文化背后的病态社会心理。由此又自然联想到,其实市场化并不能帮助解决美学问题,造型和造价也并不存在机械的对应关系,尽管建筑作为一门半艺术,从来都不能完全脱开功利的考虑。这样一种理念,既限制了建筑师的创造可能——因为仅以当今中国的人口与资源之比便足以判定,照搬任何既有的建筑类型,不管是本土的还是西洋的,都只会画虎不成——又开散了他们的创造契机——他们必须根据现有的营造条件,呼唤一场彻底推倒重来的、自内向外的视觉革命。《无地自容》一文,同样希望翻开苏轼这本古代生活百科全书,来映衬当代生活的意义缺失。如果说,像苏轼当年那样被一贬再贬,直贬到天涯海角,其间的日晒雨淋风餐露宿,反而成就了这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大文豪。如果说,人类跟自己脚下的大地,有过难以割舍的亲性和,所以当初的“地理学”观念,并非被压扁和钉死在墙上的抽象平面,而是蕴涵着新奇体验的切身观览,那么,我们这些被连根拔起的消费主义者,充其量只剩下罐装的旅游景点,很难在“行万里路”的开放探求过程中,借着对于山川河岳的游历来拓宽心胸,借着对于先人遗踪的寻访来汲取传统,借着对于人情物理的体察来增益阅历——总之不再能脚踏实地地“走”向自身人

格的成熟。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旨在就日常生活的某些热点问题,来剖析目下已蜕变成“娱乐业”的文化生活,如何受到来自“东西”和“南北”的双重压力,而暴露出双倍的困窘和变形。《足球与族群意识》一文提出,在对于足球的难以理解的狂热背后,恰恰隐藏着我们的族群意识。在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以后,人们碰巧以这种虽婉转却明确的方式,表达了整个民族苍凉沉郁的梦境,和惟恐沉沦落败的忧心。但正因此,足球在国人脚下还会一如既往的沉重,盖因他们对民族命运的关切总是这般沉重——只有等有朝一日,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其价值观念和制度结构本身,就足以带来内部的认同,人们才无需以假想敌作引子,来刺激狭隘的族群意识,也才能醒悟这种“足球情结”的荒诞之处,使之真正如冰释然。《可怕的〈泰坦尼克〉》一文提出,真正构成泰坦尼克号之悲剧冲突的,只能是那种不可一世的“技术神话”,和那些贸然以身相许的脆弱生灵,从而这出悲剧最具启示性的要点,也正在于它以惨痛的音调向我们示警——在这个一味声称“知识就是力量”的技术社会中,现代人恐怕是太迷信自身的创化魔力、太把主体当成万物主宰了。然而,影片《泰坦尼克》的拍摄和放映,本质上却又是这样一个事件:世人又往海底抛洒了一座金矿,来说明自己并未从那次海难中汲取任何教训;他们通过挥金如土的特技效果来证明,如果我们过去只有能力在造船厂里打造一条真船,那么我们现在就已“进步”到了这种程度——完全可以在摄影棚里原样复制一条假船,可以逼真而奢侈地复制人类的毁灭。

末了两篇文章,则聚焦于另一个重大的当代话题——网络与文化,说话间我们的日常生活已须臾离不开它了。《应对网络社会的挑战》一文提出,鉴于技术过程对于人类的双重含义,技